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第1章

1950年：一个伟大世纪的开端

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正隆的1943年，当时，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行将结束。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来看，这都是动荡不安的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夹着一段大萧条时期，对很多人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崭新的时代的开端。

18世纪末，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持续了近200年。以现代标准来衡量，工业革命前的1 000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微不足道。但是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以及此后的欧洲大陆、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增长不断加速。虽然以战后的增长标准来看，每年增长1%~2%算不上什么，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一个或两个世纪），这种经济（以及科技基础的）增长会使我们现在所称的工业化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收入出现巨大差异。

杰出的经济历史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画了一幅著名的图（见图1-1），这幅图描绘了随着历史的推移，经济生产能力迅速扩张所带来的人口数量的增长情况，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曲线的拐点和方向的突然改变。但是增长的受益者只是少数国家的人，从1950年至今，这部分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仅在15%左右，剩余85%的人的境况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发生变化。部分拉丁美洲地区例外，事实上它们倒退了。世界其他地方，包括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东亚、南亚和整个非洲都很贫困，人均收入通常每天只有1美元，有时候更少。大部分人在农村，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或与此密切相关的活动。1750年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处于贫困状态，与1950年世界上85%的贫困人口一样，他们生活困苦，技术和经济近乎停滞。只有少数富人，这些人或者拥有土地，或者拥有其他资产，或者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国家间的差别并不大。欧洲大陆和中国在经济条件方面相差很小：事实上，根据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专家们认为在明代（16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要略高于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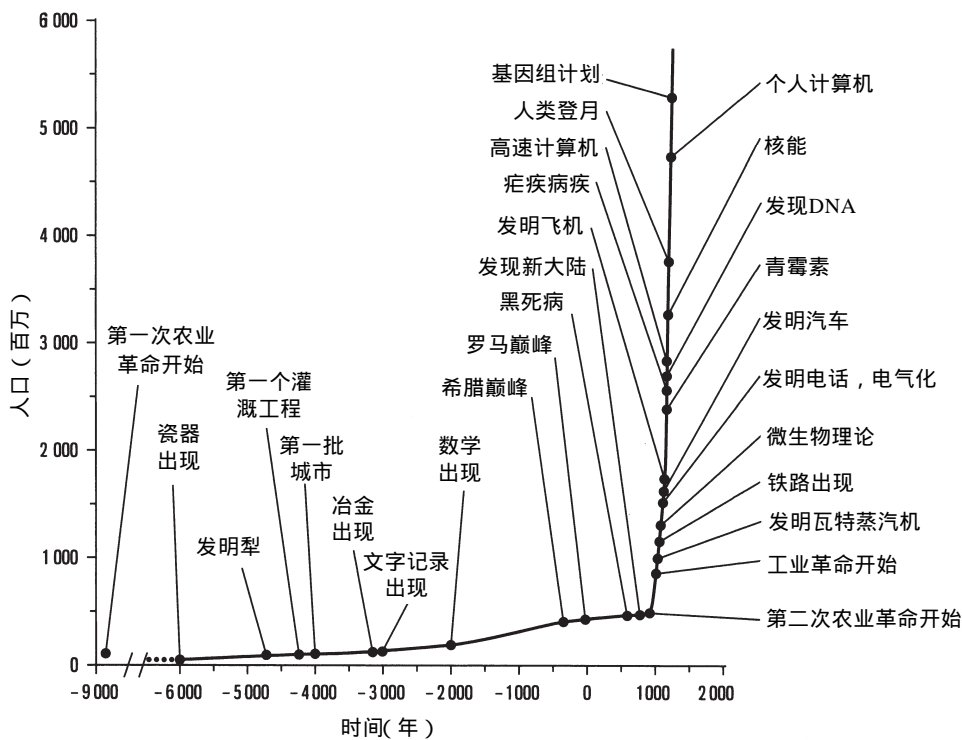


图 1-1

注：通常，从生产工艺或机械的发明到普遍应用于生产过程，存在时滞，图中的“开始”代表该项工艺或技术扩散过程的早期阶段。

资料来源：Robert Fogel, "Catching Up with the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1) (March 1999): 1-21.

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都确立了扩张的目标，虽然前者是在工业化国家的世界扩张，后者是在工业化前的殖民地世界扩张，但是它们都因在第二次世界大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战中战败而发展受阻。放眼天下，殖民结构的消亡已经兴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国家已经完全消亡了，随之产生了大量规模不一、形态各异的新国家，这些新国家最初都遭遇了一定的坎坷和困难。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部分新国家原本应该是一个更大规模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在殖民地结束时期，从经济可行性的角度来建立国家显然是行不通的。与经济可行性或常识相比，殖民历史、地理和种族的差别对最终结果显然更具影响力。最终，全世界的国家数量超过了200个，其中很多国家的建立在经济上完全不具有可行性。此外，很多国家也不具有民族或公民意识。事实证明，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建立起国家认同和坚实统一的基础是一件挑战性很强的事情。

为了建立一个更少暴力、更加稳定的世界，战后的国际议程包括：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工业化经济；在一大批由前殖民地成立的新国家中建立管理秩序和发展经济；在国家间关系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建立国际机构以管理和协调国家间的关系，以期建立一个更少暴力、更加稳定的世界。战争、流血、无力控制或阻止的冲突，这些自古有之，并不是20世纪才产生的现象。但是，20世纪战争的规模、效率和广泛性确实是空前的。战后的领导者和民众都致力于寻找一个新的、共赢的国际架构，以决定或至少是影响国家间的交往模式。推动工业革命向全球扩展的力量是科学和迅速发展的技术，这股力量使收入迅速增长，同时也使得战争更加危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一代的领导人认识到，战后世界各国拼命发展工业经济，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短缺，收入和机会的巨大差异，不断加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这些使世界面临着进一步冲突和毁灭的潜在危险。没有人知道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能着手改变全球经济的发展轨道。回顾过去，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日本在19世纪加入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自1861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经历了一段长期的现代化进程。截至1940年，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是亚洲唯一的非西方的对外殖民强国。1945年，日本战败，其前途未卜。但是日本很快成为战后经济持续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事实上也是（此前）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正因为日本的增长，其发展战略和政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策成为所有亚洲国家甚至更多国家模仿的对象。回头来看，日本的发展案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重要性无论给予如何高的评价都不为过。此外，与传统的增长不同，日本前所未有的高增长速度是在几乎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创造的，这给许多关于资源财富和发展中国家增长的传统经济理论带来很大冲击。

中国的情况更糟。由于饱受外来侵略，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9世纪实际上是下降了，在经济史上，除了大瘟疫时期，这种现象在其他时期很少会出现。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2章

从静态的角度看待变化的世界

假如我们可以向1750年的人提问：世界经济结构是否会变化？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种工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结构是永恒不变的——世界过去一直如此，将来可能也永远不变。当时的事实的确支持这种观点。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当时，世界经济在多个世纪中并未发生多大变化。换句话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即便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低增长率导致的进步也实在是太小。

但是世界并不是真正静止不变的。科学在不断进步。佛罗伦萨经历了一次文艺复兴：艺术、建筑、商业、金融、银行业、科学和工程学都百花齐放。有些时期，经过人们在广泛领域内的努力之后，人们的思想就会突破藩篱，带来创新。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从经济角度来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很慢，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大致上是一个零和博弈：一个人或集团有所得，其他人或集团就必定有所失。

如果在1750年，你告诉欧洲人，200年后，欧洲人的收入大约是亚洲人收入的20~50倍，他们会认为你有精神病。同理，如果在1950年，你告诉人们，100年内亚洲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将接近欧洲和北美的收入水平，你会得到类似的回应。但是，我们现在似乎在这条路上已走了大半程。

人类出生之后，最初是按照世界的表象来认识世界。首先看到这个世界的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静态影像，很久之后才把这些静态影像连成动态的电影。人们似乎一开始会认为静态的影像是事物恒定的常态，而非演化过程中的某一片断。这可能是因为最基本的变化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很难提前预测或考虑到将来的变化，而回顾过去则要容易得多。

当我们长大后，会发现自己处于漫长的发现之旅中：不断学习，体验痛苦和快乐，抚养子孙，并越来越聪明。在近代，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非常迅速，因此几十年内就会产生显著变化。我们开始更重视历史学家，他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变化，认识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同以前一样，现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也总是存在巨大的代沟：年轻人认为世界自始就是他们踏入时的样子，而老人只记得那个螺旋桨飞机时代的世界，而不是现在互联网时代的世界。

以静态影像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把当前所看到的世界看做现实，而不用动态电影的框架去看待世界，这种做法有时会让我们的歧途甚至倒退。目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但是正如“发展中”一词所暗示的，这并不是一个长久的状态。

“其他85%的国家”这个短语所表示的含意的演变非常有意思。在某些时候，我们不再称贫穷国家为“落后国家”，而称为“欠发达国家”。此后，“第三世界”一词完全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分割开来。而后，“欠发达国家”一词暗示这种状态不是永久性的。再后来，我们转而使用“发展中国家”，最近则使用“新兴经济体”一词，我们终于承认（虽然这个承认有点迟）一个事实：世界的变化不仅是我们所希望的，实际上也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用词上的变化标志着我们日益意识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并不会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而是处于某种转变中——从20世纪较低的收入水平排名提升到较高的收入水平排名，尽管这种转变需要很长时间。

当我开始关注世界格局（各国的洲际分布，生活条件和就业机会在各国的分布等）的时候，各大洲的经济环境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这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局限所在，反正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我仍然记得少年时代关于公平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和不公平、普遍差异产生的原因等的激烈争论。世界上存在相对贫穷和富裕的国家，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这种差异是如何持续存在的。

我的本能反应是寻找症结所在，找出是人类的哪些局限性置人于贫困境地。这种倾向并非完全错误，但是过于简单化了。有些人认为这种差异是永恒的，有些人则依稀认为是可以改变的，却并不知道如何改变。但是当时静态影像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动态以及关于速度、加速度、变化的思想是难以接受的，也令我们很不安。





第3章

战后全球经济的变化

我的父母跟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很多人一样，在大萧条最严重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寻找工作。他们并不擅长面对这种困境，同他们那代的很多人一样，这段经历对他们看待世界和寻找机遇的方式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他们知道或希望将来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他们不会为此把家庭的所有财富都赌上。他们内心是悲观的，而战后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惊喜。

他们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子女和孙辈身上，希望他们少一些动荡和危险。至少在工业化国家，这种希望能够实现甚至突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需要而采取的特殊经济政策，最终帮助世界从大萧条中摆脱。战后，欧洲和日本在美国以及新国际机构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经济结构和管理结构，增长得以恢复。迅速的技术进步（又一次因现代战争的迫切需要而加速）、生产率的提高，收入的增加，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与此相伴随的是“冷战”和确定能相互毁灭的核威胁。

有一些适用于增长率的规则。如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度使用“72法则”。该法则是说，在年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要使规模翻1番，所需要的年数等于用年增长率除72得到的数值。这听上去很疯狂，但事实的确如此。例如，每年增长1%，则收入（或者任何正在增长的事物）翻1番需要72年。如果每年增长7%（迄今为止，这是一个经济体所能维持的最高增长水平），翻1番则需要10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年。也就是说，如果年增长速度为7%，则收入和产出每10年将翻1番。这是一个大概数字，但足以用来帮助人们形成一般概念了。

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已经历过高增长的发达国家，它们的增长率能达到7%甚至更高。30年前的中国和此后的印度先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这改变了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期。原因是中国和印度合在一起所拥有的人口数量，约占全世界66亿人口的40%。此前，还有一些其他在战后进入高速增长期的国家，例如韩国。但是韩国只有4 000万人，即便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或欧盟的1/8。日本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高速增长国家。日本拥有1.2亿人，收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经济规模不到美国和欧盟的50%。相比而言，如果中国或印度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那么其经济规模将是美国和欧盟的4倍。

很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增长过程是相当混乱的（其原因接下来会讨论），且不易持续。

虽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高速增长的行列，但是从贫穷国家变成发达国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最贫穷的国家人均年收入只有300~500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在20 000美元以上。从贫穷国家到发达国家的收入下限，收入必须翻5番还要多。以年增长7%计算，增长规模如表3-1所示。

表 3-1 (单位：美元)

最初	500	第4个10年	8 000
第1个10年	1 000	第5个10年	16 000
第2个10年	2 000	第53~54年	20 000
第3个10年	4 000		

收入每10年翻1番，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了，类似于驾车以每小时190千米的高速行驶。即便以如此的高速，也需要半个多世纪才能完成整个过渡。当然，如果速度更慢，过渡将花费更长的时间。

中等收入水平为年收入5 000~10 000美元。图3-1表明了在不同的增长速度（1%~10%）下，从一个贫穷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年数。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贫穷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花费了大多数时间。一旦达到中等收入的较高水平（10 000美元），再翻1番即可进入发

达国家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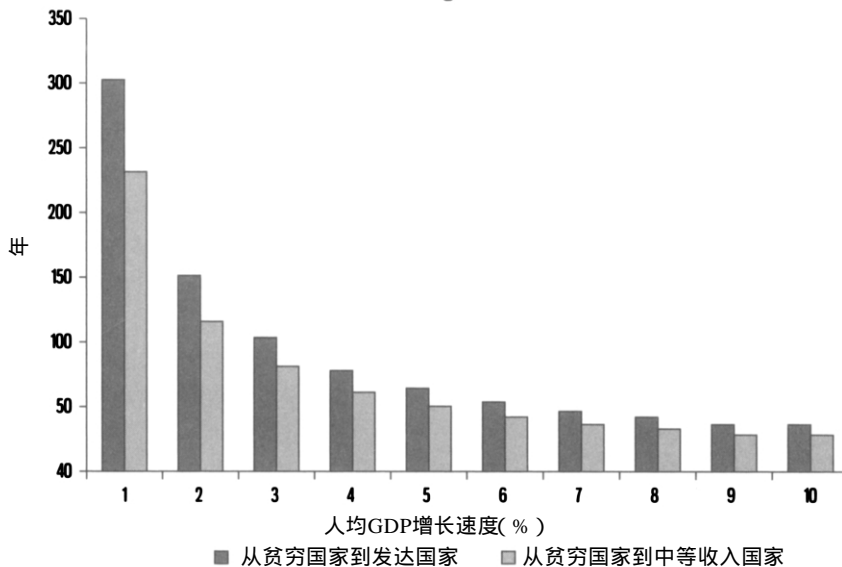


图3-1 向更高收入的过渡

最重要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增长。高速增长之后如果突然停滞下来，就会降低平均增长速度，并延长过渡的过程。

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最后一番看上去很容易，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种状况被称为中等收入过渡或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家的事实证明，这段通道很难通过，原因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讨论。但是，最耗费时间、需要长期持续增长的阶段是从相对贫穷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阶段。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人口开始爆炸性增长的时期，正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推论，人口增长若跟上收入增长，则个人的生活水平几乎不会变得更好，而只会处于维持生存的水平。现代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几乎证实了这一推论，尤其是在50年前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那些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的发达国家中，从未发生推论中的事情，具体原因现在仍然不是很清楚。

尽管科学、医学、公共医疗成功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但是产出和收入的增长仍然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因此人们活得更长久，年龄越来越大。人口虽然增加了，但是收入仍然在增加，这种切断人口和收入增长之间联系的增长模式目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前正在向发展中世界蔓延。

比较研究

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增长进行对比，结果令人惊讶，其程度不亚于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加速增长给我们带来的惊讶。1950年的非洲和亚洲都非常贫穷，由于自然资源的影响，非洲的收入要比亚洲高。亚洲最早开始慢慢加速，后来迅速发展起来，而非洲仍然以较慢的速度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和未来发展主要依赖其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向全球经济开放制造品贸易之前，事实可能如此。但是事实证明，那些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国家或地区财富价值上升了。对人力资源的使用成为亚洲发展的基础。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自然资源本身并不会成为持续发展的基础。

截至1990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增长一直非常顺利。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并正在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迈进。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也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也转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印度正处于增长加速的早期。

我们将在后面更详细地考察高速增长发生的地区和原因。但是读者应该会对一些对比案例感兴趣。

例如，50年前，韩国的人均GDP只有350~400美元（大约每天1美元，跟非洲的贫穷国家差不多），朝鲜和韩国当时的收入几乎一样。今天，韩国的人均GDP接近20 000美元，朝鲜则几乎没有进步。2000年以来，很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有点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的韩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现在这种情况开始扭转了。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均GDP已经从当时的400美元增长到现在的高于3 500美元，翻了3番还多，数亿人摆脱了贫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慢，自然灾害也时常发生。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印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成功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金融危机之后，其年增长速度超过6%（2008年和2009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前，其增长速度接近9%），数以亿计的人摆脱贫困的事例即将再现。

毗邻马来西亚的小岛国新加坡在1960年还只是一个小鱼村，人均GDP只有427美元。1960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今天，其人均GDP高达38 000美元，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小渔村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当时的另一个岛国古巴则经历了一场革命，居民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后来选择实行计划经济模式，从而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落在后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体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达国家，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很大程度上由于成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取得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此后，发达国家持续以每年2%~2.5%的速度稳定增长。除此之外，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又开始了一轮增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这次增长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推广（后面我们将专题讨论）所带来的生产率巨大提高。

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高速增长，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详细考察。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最初十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多少增长，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最初是扩大的。

经济学家的预测

面对我们未能预料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应当保持足够的谦逊，但是有些时候经济学家的预言的确变成了事实。回顾经济学家曾经对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所做的预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然，经济预测和预测者本身在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可笑的（“在最近的5次经济衰退期间，经济学家已经预测到了9次经济衰退”）。但是有趣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各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预测的确变成了事实。

图3-2显示了专家对20世纪90年代相关国家和地区增长速度的预测值、实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际值以及两者的差额。相对而言，那些预测增长速度或实际增长速度较低的地区或国家，其实际增长也往往低于预期增长。对非洲来说，这是失去的10年，但此后则迅速发展起来。对那些“冷战”结束后的东欧国家来说，这也是艰难的10年，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和政策的过渡上。2000年后，东欧国家的经济表现也迅速好转。中国的表现非常抢眼，没有人预料到中国能够达到9%的年增长速度，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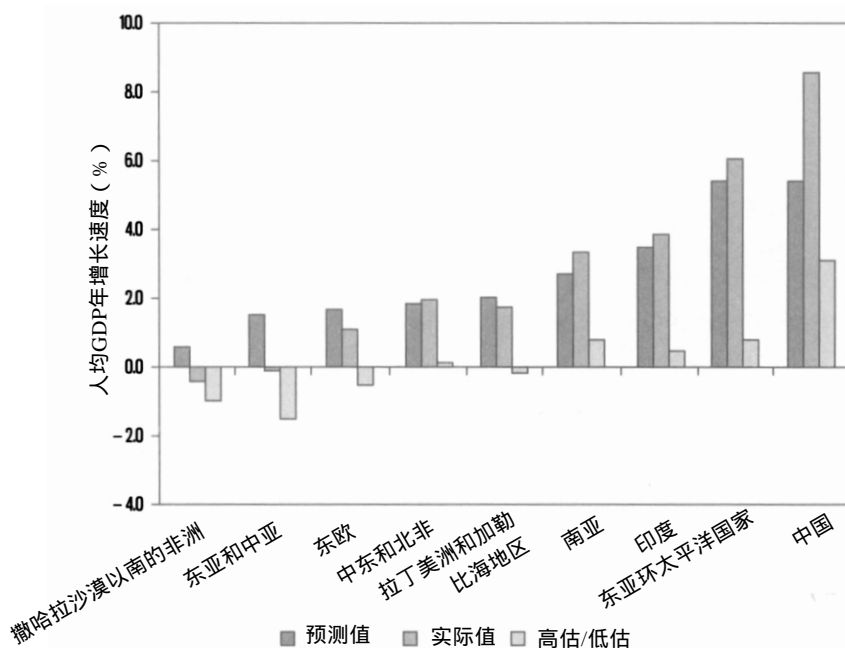


图3-2 对20世纪90年代人均GDP年增长速度的预测值和实际值

事实上，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分析师们一直在看空中国。我想提醒那些怀疑论者，在过去看空中国并没有得到好处。也许这次不同于以前，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模型不同于我们过去所使用的政府模型，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运作效率较低。但是我要套用邓小平的话：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再往前看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知识渊博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分析家几乎一致认为非洲的发展前景非常光明，而亚洲的发展前景则很黯淡。亚洲（东亚和南亚）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而且相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和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中东地区来说，其自然资源也非常匮乏。似乎它有一个不好的起点。

接下来50年的事实与预测完全相反。亚洲发现了一条融入全球经济的道路，其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起来。非洲国家则挣扎于国家建设和管理中，远远落在了其他国家后面。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就像是一种诅咒，刺激非洲的政治力量只知从自然资源中获得财富或收入，而远离了更广泛的以长期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方向。

亚洲认识到了自身的劣势，大力投资于其唯一拥有的资源——人，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并实现了持续增长。亚洲还得益于向全球经济开放，从而能够参与更广泛的商品贸易。对亚洲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制造业商品的全球贸易壁垒不断降低。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

第一，预测未来的模型和人们的预测能力都是有限的，出现与预测不同的情况是常态而非特例。

第二，逆境经常是成功之母。

第三，持续的财富创造最终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的：人，人力资本和知识，不断的经济结构变化，能够有效配置自身所拥有的资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系统。

第四，治理结构至关重要，有利的经济条件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华章图书



第4章

全球经济的起源

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简明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一颗将成为全球经济两大主要基石之一的种子就被种植了下去，不过当时还没人注意到这一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在战后决定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希望建立一个更加信任和包容的世界（尽管他们的信心并不充足）。之所以出现这种变革，可能是因为对战争本身和战争带来的破坏的恐惧。这是一场危机。通常来说，危机是变革的机会，因为危机可以削弱既得利益和抵制变革的力量。但是，机会并不总能把握住。

联合国是新的国际架构的一部分，关贸总协定则是联合国中的新兴组成部分。关贸总协定始于1947年，目的是减少阻碍贸易的关税。

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关税。作为一种对国际交易征收的税，对进口国政府来说，它是一种税收来源（尽管通常不是很重要的税收来源）。征收关税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增加税收收益，而是提高国外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从而部分地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部竞争的压力。（如果增加税收收益是主要目标，那么我们会看到更多对出口商品征税的例子。虽然存在这种关税，但并不普遍。）

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历史简介见表4-1。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表4-1 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历史简介

关贸总协定共举行了8轮谈判					
谈判名称	开始日期	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贸易谈判			成果
		持续时间 (月)	参与国 数量	主题	
日内瓦	1947年4月	7	23	关税	签署关贸总协定，影响10亿美元贸易的45 000项关税减免
安纳西	1949年4月	5	13	关税	各国交换了5 000项关税减免
托基	1950年9月	8	38	关税	各国交换了8 700项关税减免，将1948年的关税水平削减了25%
日内瓦	1956年1月	5	26	关税、接纳日本	25亿美元的关税减免
狄龙	1960年9月	11	26	关税	世界贸易中49亿美元的关税减免
肯尼迪	1964年5月	37	62	关税、反倾销	世界贸易中400亿美元的关税减免
东京	1973年9月	74	102	关税、非关税措施、 框架协议	关税减免超过3 000亿美元
乌拉圭	1986年9月	87	123	关税、非关税措施、 规则、服务、知识产 权、争端解决、纺织 品、农产品、建立世 贸组织等	通过这一轮谈判，建立了世贸组织，拓展了贸易谈判的范围，大大降低了关税（降低约40%）和农业补贴，就完全放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达成协议，扩大了知识产权
多哈	2001年11月	?	141	关税、非关税措施、 农业、劳动标准、环 境、竞争、投资、透 明度、专利等	该轮谈判还没有结束

建立关贸总协定就是为了减少这些贸易障碍。最初，重点放在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战后恢复上。但是由此产生的利益很快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尽管这项工作并不彻底，而且在刚刚经历了危机之后的2010年，存在倒退的危险，但是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巨大的成功。关贸总协定最初的定位是一个名为国际贸易组织的机构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国际贸易组织未能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因此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但是关贸总协定却存续下来，并开始逐步减少国际间的贸易和商业障碍。

20世纪90年代，关贸总协定最终由世贸组织所取代。关贸总协定是一个由工业化国家所操控的俱乐部（最初也只是为工业化国家服务的）。世贸组织则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组织，更类似于联合国，而不是G7。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这种变化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规模、力量和影响力等方面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使在全球贸易规则的修改过程中，小国、贫穷国家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原则上，世贸组织能够代表更广泛的利益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更难达成一致，目前看来，这已经减缓了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的进程。

世贸组织有153个成员和30个观察员，绝大多数观察员正在申请成为正式成员。目前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中，最大的是俄罗斯，不久的将来，俄罗斯很可能就会加入。

目前，世贸组织的主要谈判回合是多哈回合谈判（多哈是该回合谈判第一次会谈的地点），多哈回合谈判目前陷入僵局，前程难料。该回合谈判的焦点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人们已经开始质疑世贸组织这一新组织能否有效扩展全球贸易。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合作改变了国际经济运行的基本参数，事后来看，这个变化至关重要。关贸总协定是全球经济形成的开端，全球经济不仅对全球1/6的发达国家有利，对于其他5/6的国家同样有利。与旅行、运输、通信等方面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一起，关贸总协定成为第二次经济革命的关键催化剂。在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中，亿万人享受增长带来的收益，同时也要承受增长带来的冲击。这是一场革命，现在要比最开始更容易看清楚，这场革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断迈向全球经济

当战后全球经济出现的时候，殖民地体系逐渐消失了。旧的殖民地变成了新的国家，其中一些新成立的国家的形态和地理位置非常奇特。由于没有自主的民族国家治理历史，它们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经济和稳定治理方面的道路。印度建立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复杂的民主政权，这在当代是一个奇迹。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采用计划经济，虽然经济发展有限，但是通过对绝大多数人的教育，埋下了未来经济腾飞的种子。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向，成为世界历史上（就人口而言）最大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战后的人们并没有看到，过去两百年中只有小部分人所经历的经济增长即将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大多数地方。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这种新融合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事物的成本将发生变化。需要人花费时间和精力产品和服务将变得更加昂贵，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全球经济中成本较低的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数量最终出现下降。这种新融合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很多东西的成本将发生变化。需要耗费劳动时间和精力产品和服务将变得更加昂贵，这是全球经济中成本较低的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数量最终下降的必然后果。在经济力量的驱动下，可以给劳动力配备更多资本，以降低对劳动力投入的需求，从而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有限的，其限度大小随技术的进步而变化。但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有限制的，即便这种限制正随着技术对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改变而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世界经济中大量的半失业劳动力延缓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到来。但是21世纪，这种状况将会结束；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在沃尔玛、塔吉特看到价格低廉的商品，但是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工业革命这个称谓非常贴切。它是一场多维度的革命：生活标准提高，贫困减少，知识增长，获得信息、机会并将科学思想应用于经济生产实践，通信、公共卫生和资源得到了分配。现在所有这些知识和技术都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过去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得到的东西将成为新的占人口大多数的高收入群体生活一部分，这种状况对我们的子孙来说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未来可能仍然有一小部分人继续生活在低增长的环境中。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无法确知。希望他们也能实现快速增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要找到一条融入全球经济的道路，使经济蓬勃发展并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尚存在很多困难。如果这种情况不幸成为事实，将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我将在后文讨论这个问题。



第5章

经济增长

为什么我们对增长感兴趣

人们对增长本身并不关心。毕竟，增长只是对经济变化的特定方面所进行的统计。通常，人们更关心精神层面的东西：价值观、宗教、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物质层面，人们关心机遇、富有生产效率和创造性的就业机会、对社会的价值、教育和健康，简言之，就是那些能够有助于创造自由和发挥他们潜力的事务。

增长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上述物质层面的东西都与收入和财富息息相关。更明确地说，这些东西受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影响。顺便说一句，对非常富有的人来说，财富的价值更多的是一种衡量成功的尺度，因为超过一定点之后，事实上富人几乎不可能消费更多的财富。

在我们的世界上，大量财富只是一种带来声誉的成功标志。对这些财富的追求远远超出了财富本身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并不多，占有财富是他们预防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收入中断的最好手段。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的目标是达到能够体面生活所需的收入水平。

我们的兴趣是长期的持续高速增长，因为它能改变收入水平，减少贫困，增加生产效率和创造性的就业机会。虽然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公司和股东们

时刻都在讨论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实际上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

经济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经济增长与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有联系。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我们的子辈或孙辈能够获得比我们更好的机遇和选择。这种偏好贫穷国家尤其根深蒂固。以我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经历来看，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后代创造机遇，他们愿意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在这个意义上，增长或者说是持续的增长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反对这一价值体系。他们认为，对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追求走得太远了。对更高收入的无限制追逐，使我们忽略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高估了收入和物质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度，由此产生的价值观更像是一场无聊的竞赛，而不是给人们获得更多满足感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幸福的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

这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重要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因素的推波助澜下，我们的优先次序和经济选择会出现重大变化。但是目前，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十几亿人在这样做，其余国家的人期望能追赶上发达国家。而这个期望很合理。如果你的年收入是800美元，那么与年收入40 000美元的情况相比，额外增加1 000美元会带来更多的价值。即便收入增加的绝对数额相等，穷人的收入增加百分比也要比富人高得多。但是对穷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额外增加的1 000美元有可能使他们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这种不对称是重要的，也是造成误解的潜在原因之一。我们应当欢迎对发达国家关于物质的价值观的质疑，并反思当下放任自流的功利主义的利益和成本，或者说是独立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的。发展中国家应当从多个角度关注可持续性问题的，但是当它们的收入增长逐渐能够创造更多当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居民才能获得的机会时，它们对更高的经济增长或不同的增长模式才会更有热情。

领导力和政治

当我开始学习和研究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课题主要是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甚或完全是经济学课题。现在我不再这样认为了，这并不是说经济变化在动态增长过程中是无关紧要或完全不相关的，事实远非如此。经济增长是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剩余部分则与下列因素关系更加紧密：领导层、治理、制度、政治以及这些因素和经济产出过程的相互作用。

坦白地说，增长需要投资，这意味着为了将来的收益，需要牺牲当前的消费。领导者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在令人信服的增长和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团结所有的人，达成前瞻性共识。这需要各个层次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自愿参与进来，包括劳动者、工会、商业和企业家、民间社会组织、不同层次收入分配环节的居民。

很多国家在无增长或低增长模式下浪费了过多时间。必须打破这种均衡，转入新的可持续模式中。很明显，旧有的均衡模式并不一定会在狭义的经济体系内自动被打破。独立于经济之外的、能够改变发展轨迹和预期的转变是必要的，这种外部的动力经常来自于危机中或危机即将来临时的领导层。有时外部经济环境的有利变化会引起额外的微调，而且我们知道示范作用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越来越容易地通过电视或互联网为人们所知）会改变领导者和公众的意识。

如果公众相信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因他们的牺牲而生活得更好，他们愿意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但是必须让他们相信，经济增长将会产生这种结果，而且这一进程具有包容性，不会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公众未必要求政府是民有的、民治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的、民享的政府，并被人民感受到是民享的政府。

在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治理与欧洲人所称的“凝聚力”有着密切联系。其他一些人把“凝聚力”称为“认同”，虽然这两个词并不是完全相同，但却密切相关。历史悠久的国家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已经成功建立起了具有共同归属感和共同利益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共同的信念，不论时局好坏，民众们都团结一心。它可以使国家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模式，确保每个人的利益，保护逆境中的人们，让国家具有一种弹性。

我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这种“凝聚力”，但事实上，我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们不应这样认为。在我成长的加拿大魁北克省一度被认为会因复杂的历史原因而独立出去，但是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很多魁北克居民不认同以英语为母语的主流人群，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与此相似，苏格兰人也时常产生分裂主义的冲动。美国内战是为了结束奴隶制，但是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南北方在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上的深层次差异。

新的国家，尤其是语言、宗教、种族或部落复杂多样的国家，在建立这种认同感或凝聚力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没有这种认同感，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就会存在很多陷阱。通常过多的精力和人才被用于争权夺利和控制资源。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变化，需要进行投资和随之而来的牺牲，那些国家通常把太多的精力和人力用于争夺权力和控制资源，而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需要相应的投资和牺牲，这些蓄意的、有组织的冲击使其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亚洲和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国家都曾因这一挑战而栽过跟头。像纳尔逊·曼德拉这类伟大领袖，之所以能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部分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的领导地位促进了共同价值观、身份认同感和国家自豪感的建立。新加坡虽然小，同样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李光耀和他的同僚所追求的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通过就业、获得教育机会和提供公共住房等政策来实现平等和包容的承诺。

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汉族，这种身份认同是两千年来的历史形成的。在集体选择和治理方面，这是一笔隐藏的但却无价的资产。印度自1950年独立以来的民主奇迹在于，它在一个宗教、阶级、种姓和语言多样性的极端复杂的环境下，成功建立起了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对印度来说，其之所以有能力做出艰难的选择，进行投资并实现经济增长，基础就在于其建立起了自我治理的能力。当然，建立民族和文化认同感也存在不利的一面，几乎不可避免的，有“我们”，同时也就存在“他们”。

随着全球联系的增强，对全球相互依赖的经济的治理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更多细节）。为了集体和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建立新的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权威和合法性将部分依赖于它们公正无私的行动能力和公众洞察共同利益的能力。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对“我们”这个概念做一些修改，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使其超出国家界限可能是必要的。民族主义有时有利于在一国范围内做出有远见的集体选择，却可能在国际合作中起到阻碍的作用。

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放弃我们是某一国公民的想法，我们都拥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是我们整体形象和人际关系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我们成功实现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我们的认同感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增长来自于何方

我们暂且放下发展中国家，转而讨论过去250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文已经讨论了我们对收入增长感兴趣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人力劳动的产出。劳动生产率又转而取决于他们的技术（个人的和整体的），取决于工人工作所赖以存在的其他形式的资本（如计算机等高科技工具），取决于机构在市场体系范围内的监督和治理效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资本增加的时候，劳动生产率也能提高。当市场激励发挥作用的时候，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明显的案例之一就是1978~1980年，当中国的农民第一次被允许出售超过计划目标之外的剩余农产品的时候，中国的农业产量大幅上涨。虽然市场激励可以提高效率和生产率，但是并不能带来生产率和收入的持续增加。类似地，仅仅通过增加资本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存在限制。收益最终会下降。但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收入和生产率一直在增加。所以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增长来自于何方？

答案是创新。

创新（有时候被称为技术进步），能够随时间推移而提高经济的生产潜力。这意味着用同样的资本、劳动、原材料和能源等投入，可以生产更多或更有价值的产品，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生产既定数量产品所需要的成本降低了。一些技术是劳动节约型的，例如使用网络计算机和现代信息技术来代替信息的人工处理。还有一些主要是节约资本的技术。手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建一个手机网络所需要的资本要比固定电话网络所需资本少得多。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对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信息和通信技术差距具有深远影响。有些技术进步则是中性的：它们同比例地节省所有投入要素。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一些读者可能会比较熟悉“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名词。在普通英语中，这个词通常意味着在要素投入一定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多少产出。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中，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发生变化，则主要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或者当（发达国家）既有的技术和知识被收购、转让并在新的环境中使用时，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发生变化。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这正是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技术和知识、技能和诀窍被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这对潜力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同样如此，这是发展中国家能够以远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的主要原因。

所谓创新就是运用新知识制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工艺或降低成本等方式来增加价值的过程。它并不是如同变魔术般凭空变出来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现代增长理论的很大篇幅就是用准确的术语来解释存在哪些促进创新的经济动因，这些经济动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为该理论的目标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动态模型的一部分，因此经济的技术基础被认为是经济运行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经济体系，所以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与很早之前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建立的创造性破坏发展理论相比，内生增长理论的解释更为准确。就成本或产品的差异化而言，创新赋予了创新者（或拥有该创新的企业）市场优势。利用这种市场优势所创造的增量利润即为对创新支出或创新投资成本的回报。但是这种市场优势是暂时的，简单来说，它将持续到下一个创新超越或替代现有创新之时。这就是创新所具有的“破坏性”的一面。这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与创新的市场回报相对应的。技术创新既能创造价值，也能破坏价值。但是当创新发挥作用的时候，其整体来看是创造大于破坏。

创新和生产率增长对经济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新的产品和企业进入市场，替代旧有的产品和企业。有时一家企业可以同时占据这两个位置，也就是说该企业将引进新的产品以替代自己的原有产品。你可能会问，企业为什么会这样做。答案是潜在的竞争。如果它不这样做，一些既有企业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新企业也会去做。如果该企业自己不去做，一定会遭受损失，因此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去做，即便这样做带来的净利润增长少于新进入者这样做所产生的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净利润。

新产品的引进和替代旧产品的过程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引擎。有一些互补因素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例如，一家成功实现创新的企业很可能会扩张，以便获得更大规模所带来的额外收益。通常来说，在很多行业中，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随着规模的扩大，平均成本会不断下降。对拥有新技术或新产品的进入者来说，其进入市场的难度增加了。这为成功的创新制造了更多麻烦。这些静态的互补因素可能会在短期内影响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但是创新的根本动力仍然是由“竞争性创新”所决定的。

但是就创新的促进作用来看，存在一些比经济激励和暂时性市场优势更重要的因素。自然科学、工程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会先于并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经济激励对建立科学知识的发展基础具有一定作用，但是人类的好奇心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非经济性力量。

对获得他人认可和尊重的渴望也是一种强大的人类动机，它能扩大人类对创造新知识的渴望。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主要的艺术和建筑项目经费是由富有的个人提供的。这些项目中很多都与天主教或其教堂和大教堂有关。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制度：创造出了伟大的艺术；艺术家能够获得报酬，有些还获得了声誉和随之而来的市场力量；有钱人既获得了财富，也获得了对教会表示虔诚的机会；教会则获得了强大的筹款机器。¹

在此，我们获得了一个纯经济动机和其他类型的动机共同创造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的案例，也许现在的类似案例是由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美国战后的制度非常成功，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采用。该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有一套强有力的规则，在这套规则下，成果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创造出来的知识应当免费提供给全世界，这套价值观在全世界大学培训课程中灌输给青年学者。这是普世价值。因为不存在专有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直接经济收益。

但是，如果投资者投资于新技术是为了获取收益，那么就必须有专有权。因此存在一个知识共享向企业家和私有部门专有转化的过程。在共享知识的基础上，私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投资，将知识转化为技术和产品。在这个过程的下

游阶段，经济激励将占据统治地位。

即便是在产品和技术领域，他人的认可和对创新的渴望仍然发挥着强大作用。人们可以看到，在开源产品的开发中，创造性和他人的认可（以及可能紧随其后的获利机会）起着核心作用。

人们希望得到金钱回报，也同样希望以创造性和对社会的价值来获得认可。在当今时代，西方国家通过提供工具和关键性投入使这种人性的冲动发挥作用，并从中获益。

对基础科学到工程学、生物医药科学的各层次教育的投资及提供的其他许多帮助，把经济和社会利益与人类最基本的动机有效结合起来。现在这种状况正在向全世界蔓延。²

平行发展：逐步前进的先决条件

经济增长总是和政治、法律和监督机构的发展相一致。这在国家、地方或国际层面上都是适用的。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经济能力的增长和政府效率相辅相成。

机构的发展和市场的推动哪个先出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论。正确的答案是同时出现，不分先后。

至少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有些时候的思考是有逻辑的和线性的。从逻辑上说，人们总是会考虑前提条件，即首先要有一些前提，然后才有达到某个结果。首先你需要有确定的、法律上可以强制执行的产权，然后你才能用其投资并获得收益增长。

但是现实中，在经济增长和有效政府的问题上，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说只有在局部和正面反馈中如此。整体来看，就成了非常平顺的平行发展。现实中有数以百万计小的正面相互影响和反馈。教育经费增加，教育变得更有效率；人力资本增加，私营部门投资回报提高；外国直接投资扩大，税收和政府收入上升；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教育投资增加。我们不可能追踪所有的相互影响和影响的大小，小的改善和长期的进步在逐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教育变得更加便宜，并逐步提高人力资本，而这又反过来转化成了技术、管理和政府能力。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更强的竞争打开了世界经济的大门,附着着的学习和知识转移促进了收入增长,也增加了对教育机构等的投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反馈都是正面的。投资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劳动的价格(这是好事)并降低了投资收益,从而降低了投资率,这又会降低投资的增长速度。

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是很重要的。印度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印度的政策制定者知道这一点,访问过印度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一点。这个国家正在稳步前进,特别是最近,但还是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发展起来。相比中国,印度的基础建设很差。毫无疑问,中国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其经济增长。而印度在过去10年也实现了高增长,问题是:印度要实现类似中国的增长速度,必须缩小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吗?直观看来似乎如此,但答案是否定的。

印度的教育产出和基础设施正在迅速增长,这足够支持其经济增长。要明白这一点,就需要注意到,15年前中国的基础设施跟现在的印度类似,而且15年来以每年9.5%的速度在增长。如果人们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弥补如此巨大的差距,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追求这一目标会造成混乱。而降低增长速度的正是这种混乱,而不是差距本身。

一个必然的推论是,在动态环境下,要寻找导致变化的原因是困难的。在那些描述这些变化过程的模型中,变量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系统内由模型自己决定(经济学上称之为“内生的”),另一类是由系统之外的因素决定(“外生的”)。对内生变量来说,一个变量的任何变化或多或少都会导致其他变量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它们是共同决定的,除非有些特殊原因导致模型具有非同寻常的“三角形”结构,否则谈论谁决定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外生变量是什么样子呢?就增长来说,外生变量通常被看做增长的原因或必要条件。这些经济上的外生变量包括政府政策、公共投资以及外部的全球经济环境等。有时候人们会把外生变量和不受约束的选择视做同一事物,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造模型是为了梳理重要的影响因素和相互之间的影响。哪些是外生的,哪些是内生的,由模型的建造者自己选择。我有一位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同事,

第一部分
全球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他正忙于把传统认为是外生变量的政治和政策选择设计为内生变量。他的主要观点是政治和政策选择受经济产出的影响和限制，反之亦然。这是极其重要的工作，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政治、经济和集体选择的相互作用，它同样把传统认为是外生的变量设计成了内生变量。

当然，这让我们重新面对寻找起因和起点的挑战。

事实上，这些因素是如何促进经济开始增长的？此前这些因素为什么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这的确有点神秘。我们将在第二部分重新探讨这个问题。





第6章

关于发展中世界和全球经济的一般性问题

发展中世界广袤、多样，有些国家很庞大，有些则很狭小；有些经济高速增长，而有些国家则刚刚起步，甚至仍然停滞不前。如果你跟发达国家的人们提起发展中世界，有些人会想到正与艾滋病和其他健康问题作斗争的非洲贫穷国家，有些人则会想到不时引发武装冲突的政府治理问题。

有些人将会想到拉丁美洲，尽管拉丁美洲收入较高，但是面临着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公平、贫民窟、毒品等治理挑战。有些人则会想到高速增长的东亚，他们熟知亚洲四小龙，知道中国和亚洲不断增大的经济规模和力量。很多人则对印度的加速增长和不断提高的预期与其农村的贫困之间的矛盾困惑不解。

这幅拼图就是发展中世界，把这些碎片拼凑成关注的焦点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外援和增长

在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是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否利大于弊？关于这个问题，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有一场著名的论战。萨克斯辩称，贫穷国家存在低收入陷阱，而适当的外部投资可以帮助贫穷国家脱离低收入陷阱。伊斯特利则指出，就经济表现而言，外国援助和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很弱，而且援助容易让发展中

国家产生依赖，从而削弱其自力更生和改革治理的能力。

公平地说，他们两人都同意，他们的辩论并不涉及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在饥荒、冲突和流行病爆发等时期的援助）。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除了一些间接的方式，并不会对经济发展和增长产生影响。辩论主要是关于发展性援助，即为了改善经济状况和迅速推动经济增长而提供的援助。

虽然援助是西方国家所关注的话题，但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却是误导视听，我们所看到的战后增长案例中很少归功于外国援助。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相对自由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学习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增长的更重要的因素。

直到最近，很大一部分西方国家关于发展中世界的讨论中，仍然很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挑战，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流方面，如通过援助、贸易、工作岗位转移、移民或投资等进行交流。其隐含的假设是这些外部影响才是发展中国家变革的主要催化剂。

这是一种不完善的、有点自恋的观点。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及其相关机构的交流完全无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内在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而外部交流则只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当我进行全球旅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时下人们的看法。

全球经济中收入来自于何方

G20成员国再加上几个还未成为其成员国的较大国家，总收入占据了全球总收入的绝大部分。G20包括的发达国家有：欧盟成员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G20还包括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韩国（现在正接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¹ 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国家包括墨西哥、埃及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将来也会加入G20。

G20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在85%~90%，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2/3。由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于2008~2009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G20的作用比之前更加清晰，开始占据突出地位。原因很简单：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观察家们都认识到，对全球经济的有效管理离不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集团从G7（或者称G8，因为俄罗斯部分参与其中）变成G20，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没有任何争论和不同政见。其余的发展中国家将其看做一个小集团，并担心自身利益得不到足够重视，但是G7的时候也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一场危机可以拆除障碍物，转变旧有的思考和互动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多数时期，国际经济的优先次序是由G7来决定的，而且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也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来管理。我们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但是新的机构仍未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在未来被建立起来。因此，我们正处于全球治理大变革的未知领域中，沿途很可能会出现失误和颠簸。2008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波动和不稳定通常被认为是一场百年一遇的巨大风暴。对我来说，这更像是将出现长期潜在波动和变化的信号或前兆，它将对全球经济的管理构成挑战，对我们过去五六十年所经历的那种增长收敛模型也是一个考验。

G20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样呢？全世界有223个国家和地区，G20之外的大约有200个，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3（大约22亿人，平均每个国家1 100万人，规模相对较小），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15%。虽有例外，但平均来看比较贫穷。这200个国家中，大约75个国家的人口少于200万，这些国家非常小，因此其经济更加脆弱。

就人均收入来看，G20的人均收入大约为10 000美元，并且增长很快。其他国家的平均收入为3 300美元，且增长缓慢。这两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

发达国家大约有10亿人口，其收入占G20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为63%。G20其余国家有32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一半），其收入占G20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为20%~25%。200个G20以外的国家，其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为15%或更少。很明显，工业革命的前200年所产生的广泛差异现在远未消除。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各国对贫困的定义各不相同，都是用来区分社会中相对弱势的成员。但是要从经济发展和国际比较来说，我们需要一个绝对标准。这个标准通常设定为每天1美元或2美元。

图6-1是按照每天1美元的标准画出的全球贫困人口分布图。发达国家几乎没有贫困人口。通常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困会减少，但是这一过程受收入分配的影响。拉丁美洲和非洲收入不公平的程度非常高，因此相对于其收入水平，贫困水平更高，但是这可能会带来一点小麻烦，在非常贫困的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是贫困的，以收入来衡量的不公平水平很低。结果，好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导致了经济增长，并造成了收入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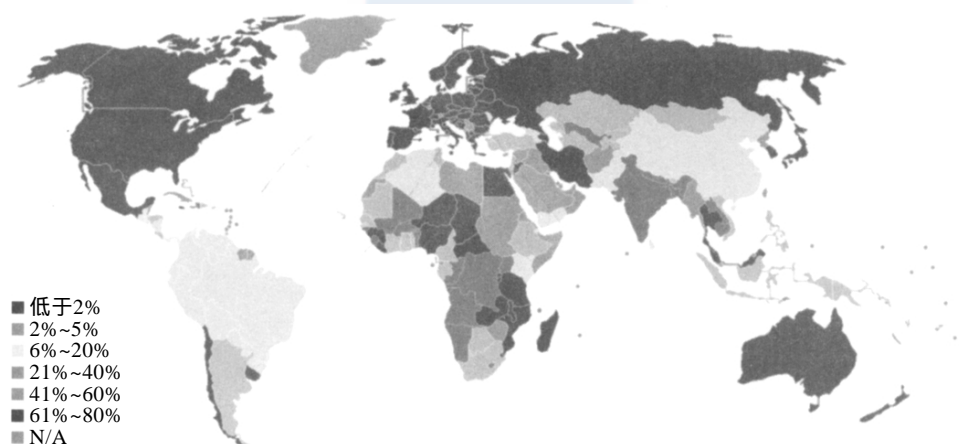


图6-1 贫困人口分布

资料来源：UN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2008.

很明显，在收入非常低的国家，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关键动因。亚洲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亚洲高增长国家的贫困人口下降非常迅速。图6-2是同样按照每天1美元的标准所画的25年前的全球贫困人口分布图，在图上，亚洲黑色的区域要大得多。印度由于起步较晚，贫困人口的比例仍然相对很高。随着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其贫困人口的比例将出现显著下降。但是由于印度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庞大，因此其贫困人口的密度仍然很高。要知道，印度的人口是所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有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总人口的2倍。尽管有高增长，印度公民（尤其是那些穷人）、印度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还是很关心包容性，即保证增长的收益能够公平地分配，尤其是覆盖70%人口所居住的农村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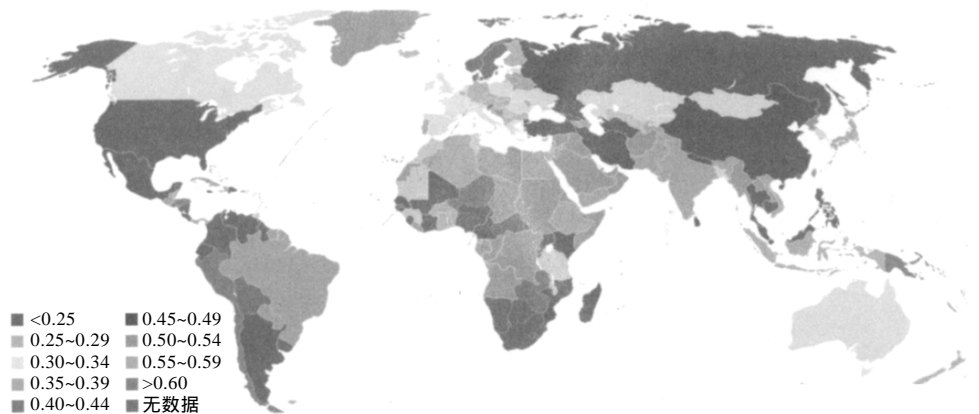


图6-2 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CIA-The World Factbook 2009.

最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贫穷国家中的贫困。保罗·柯里尔（Paul Collier）将这些国家的贫困群体称为“最底层的10亿人”。这些国家的问题不是现在这些人的贫困，而是其子孙后代仍然不会有所改善。由于缺乏增长的条件，这些国家最大的可能就是继续贫困下去。

虽然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仍然存在其他重要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不能获取基本服务和缺乏制度基础是严重的制约因素。素质教育的缺失也很严重，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以及缺乏信用和金融服务也是重要原因。后者严重阻碍了穷人储蓄和投资、从事商业和扩大经营的能力。公共部门对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的投资不足也会使很多国家的农村地区（多是穷人集中的地区）生产率增长滞后。

全球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在已知的案例中，贫困的减少依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因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能够减少农村人口，减少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并最终提高农村的生产率。

也有偏离这种模式的情况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城市化步伐过快，超过了生产性就业职位的增长，结果贫困人口并没有如此高比例地集

中于农村地区（那里有很多地方是无人区），而是集中于城市的贫民窟。

中国经济规模有多大

中国经济的规模现在还不到美国或欧盟（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经济的35%。中国已替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欧盟和美国经济规模相近，以产出来衡量，其占世界经济的比例还不到22%。假定当前的增长率不变，中国经济将在10~15年后与欧盟和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人均收入将是美国的1/4。中国的人均收入要接近这些发达国家，还需要额外的15年（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降低的话，需要更长时间）。

这种计算方法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方面，当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的时候，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主要经济强国了（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主要经济强国了）。此前从没有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实现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力，其维护和稳定世界经济体系的责任也越来越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致力于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本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此对中国来说，如何平衡国内增长和发展与其日益增长的国家力量、影响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将是巨大的挑战。这将使中国产生内部张力，并使对全球经济的管理更加困难。我将在第四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印度和中国的联系在哪里

印度经济增长加速的时间要晚于中国，加速也相对较慢。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印度经济增长加速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假定两国都保持差不多的增长速度（9%或更高），印度将落后于中国约14年。当前印度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3，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也远快于印度。但是这种情况将发生变化，未来15年，印度的贫困人口很可能会急剧减少。但是印度由于落后于中国大约14年，其格局应当和中国相似。

印度和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与中国有很大差别。

下一次大趋同
The Next Convergence

过去4年，印度的人口年增长速度是1.4%，而中国由于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年增长速度只有0.6%。人口增长速度1%的差别会导致印度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降低1%。中国的人口更加老龄化（实际上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因此人口分化的范围也可能会扩大。相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更高的人口增长率将对人均收入增长产生少量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教育、就业机会和妇女权利的增加，生育率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例如，墨西哥的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下降。因此，随着印度变得更加富裕，其人口增长率也将下降，从而加快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

中国和印度的GDP加起来，约占全球GDP的8%~9%，而且还会增长。中国人口有13亿，印度有12亿，加在一起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接近40%。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G20国家总人口的60%。再过几十年，这两个国家将成为重要的发达国家。比如，到21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的产出将占世界发达国家总收入的60%，而美国和欧洲只占10%。目前，欧盟和美国的收入之和约占G20国家总收入的60%。到时候，美国和欧盟的经济规模，甚至地位，将会与中国和印度发生反转。我们无法事先得知这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就经济力量的分配而言，将会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